

文书行政与秦代洞庭郡的县际网络*

郭 涛

摘 要:里耶秦简牍是秦代洞庭郡下属迁陵县的文书档案,为了解秦帝国末端行政运行实态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也为还原洞庭郡十五个属县的设置情况和县际文书交往所依托的道路交通网络提供了条件。洞庭郡府的群发文书从郡治临沅或新武陵发出,分成四道依次传递到各县和都官机构;这些交通线不仅是洞庭郡内部文书传递的主干路线,也是洞庭郡与外部郡县交往的媒介,其所从属的交通网络支撑着洞庭郡日常的行政运行。同时,它与其他区域的道路交通相衔接,共同建构起了秦汉帝国的道路交通体系,在帝国行政中发挥着经络般的作用。以律令为指导,文书为载体,借助于初成体系的郡县行政制度和相对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秦帝国的行政政令得以贯穿整个帝国,发挥着行政效能。

关键词:里耶秦简牍;洞庭郡;地方行政;文书;交通

中图分类号:K233;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0-0155-13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17.10.016

作者简介:郭 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9)

秦汉时期是帝制中国建立的初始阶段,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发展是其中的一条主线索,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行政关系。因此,中央和地方的连接环节显得尤为关键。战国秦商鞅变法“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四十一县”^①,由中央直辖,确立了县的行政枢纽地位。统一进程中疆域拓展、县数剧增,“郡”因功能凸显逐渐凌驾于县之上且由军政而民政化,中央一郡一县的行政结构实行开来。帝国秦时废分封行郡县,通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②,将全国分区而治,以郡作为地方最高政区,进而统辖全国约一千个县级政区;将郡守、郡尉、郡监定义为中央派出机构充当臂掌管控地方事务,并分权并立、相维相制,从而在制度层面、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中央集权之下的郡县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地方行政制度代表的郡县制此时处于奠基期,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在职官和地理两

收稿日期:2017-07-22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出简牍与秦帝国末端行政运作研究”(项目编号:17YJC770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史记》卷68《商君列传》。其中的“都”字,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予以保留(第2232页),2013年中华书局修订本则去之(第2698页)。保留“都”字的理由,参见[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日]广濑薰雄、曹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4-65页。

②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9-240页。

个层面都可谓汗牛充栋,知识体系已经初步搭建。但由于史料的局限,仍然存在诸多盲点,无从得到实例证明,运行情况更是不得而知。单就地理而言,透过传世汉代文献已大体揭示秦代存在“郡—县—乡—里”的行政层级,结合零散的文献及出土资料亦可推断秦郡属县的大致情况,但一直没有系统的资料及具体案例加以论证。所幸的是,日前陆续出土并公布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地方行政文书,与以往发现不同的是,这些资料多属于行政运行实态过程的档案记录,是可以与律令、制度相互印证或补正的运行实例,能够将地方政区的设置情况落到实处^①。其中,2002年出土于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牍,是秦代洞庭郡下属迁陵县的公文档案,时代跨度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到秦二世二年(前208年)^②。作为目前资料公布相对充分的秦代地方政府档案,里耶秦简牍对于还原洞庭郡和迁陵县的组织结构无疑是绝佳的材料,秦迁陵县则为了解帝国行政运行实态提供了难得个案。随着资料的陆续公布,秦代洞庭郡的面貌以及迁陵县的乡里组成也逐渐清晰起来。早前有学者曾藉此坐实了秦朝在地方行政建制中存在“县—乡—里”的结构,后又详细勾勒了迁陵县的乡里面貌^③。本文则尝试从“文书行政”的角度继续利用这批地方文书档案来还原洞庭郡的属县与交通网络。

一、洞庭郡的境域与属县

文书是行政的重要载体,秦汉文书以简牍为基本形制,文书形式包括下行、上行和平行文书三大类,根据行政制度的规定连接着不同的区域和人员,沟通起不同层级的机构与官员,频繁的跨区际、跨层次的文书交流形成了行政赖以维持的信息网络。“文书行政”支撑着汉帝国的日常运转,而这一运行模式是承秦而有的。里耶秦简牍中洞庭郡的下行文书通常以“以道次传”的形式群发到郡属各县,要准确把握洞庭郡的属县情况,“文书行政”是一个恰当的路径^④。不过在揭示属县之前,有必要先对洞庭郡的境域有个整体性的认识。

① 古城遗址所出地方衙署档案,秦代的包括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镇里耶古城遗址所出秦代迁陵县政府公文档案;2014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所出楚、秦、汉、三国吴益阳县政府公文档案。可以对照的是2014年湖南湘乡三眼井遗址所出楚国县邑公文档案,2003年湖南长沙走马楼遗址所出西汉长沙国公文档案,等等。这些资料大多出土于古城衙署遗址的古井中,属于秦汉地方政府的行政公文档案,其形式是明清时期之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古代档案,以及现代地方政府档案之源头。尤其是兔子山遗址所出呈现完整序列的益阳县档案,是战国秦汉存在前后相续且行之有效的地方行政的直接证据。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年风云激荡 两千年沉寂后显真容——益阳兔子山遗址简牍再现益阳古代历史》,以及兔子山考古队:《益阳市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概况》,两文见于《中国文物报》2013年12月6日第6-7版;罗武强:《湘乡发现三眼井古文化遗址》,《中国文化报》2015年2月18日第10版“湖湘文化·综合新闻”;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200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4页,等等。

②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4页。除此之外,本文所引里耶简牍资料主要还见于以下论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版;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春龙、宋少华、郑曙斌主编:《湖湘简牍书法选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湖南省文物局编著:《湖南简牍名迹》,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黄朴华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年版;游逸飞、陈弘音:《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第九层简牍释文校释》,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68,2013年12月22日。其中第五层、第六层、第八层简牍编号以《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为准,引用简牍凡见于以上书目者,不再一一注明,特殊者另行说明。

③ 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晏昌贵、郭涛:《里耶简牍所见秦迁陵县乡里考》,《简帛》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54页;鲁家亮:《里耶秦简所见迁陵三乡补论》,《国学学刊》2015年第4期。

④ 关于“文书行政”的概念,可参见[日]永田正英《文书行政》,王勇华译,收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4-243页;[日]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刘恒武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102页;[日]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354页。另外,本文所言“县际网络”主要是指县与县之间文书交往所依托的道路交通网络,至于县与县或县内机构之间日常的文书及人事运行网络问题容另文讨论。

由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作(以下简称“谭图”),其中秦代疆界和政区部分以《秦郡新考》和《秦郡界址考》两文的结论为基础进行绘制,是21世纪以前历代学者据传世文献进行秦郡探索的成果结晶,几成定论^①。但是,自里耶秦简牍“洞庭”、“苍梧”两郡名出现后,谭图所确定下来的秦郡体系受到了冲击。有鉴于此,周振鹤对谭图相关图幅作了改动,将“黔中郡”名改“洞庭郡”,“长沙郡”名改“苍梧郡”,并将洞庭湖移属洞庭郡^②。这一调整大体允当。他所复原的秦代洞庭郡的境域基本与《汉书·地理志》(以下径称《汉志》)武陵郡相当,秦洞庭郡实为汉武陵郡之前身^③。但是,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秦设洞庭郡到《汉志》文本形成,其间已历时约二百年,边界及政区的调整不无可能,处于郡界边缘的孱陵县即是一例。《汉志》“孱陵”属武陵郡,但根据新出文献可知,秦及汉初孱陵县以划属南郡为确,不当属洞庭郡^④。

《汉志》记载,汉成帝时期武陵郡的属县共有13个^⑤。《里耶秦简(壹)》面世后,于洪涛、郑威、庄小霞、游逸飞、晏昌贵等均据以辑录洞庭郡的属县,并与汉武陵郡对照,秦代洞庭郡的属县基本得以确认^⑥。晏昌贵对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目做了系统梳理,他所辑录的洞庭郡属县(道)最为完整,多至17个,与《汉志》武陵郡所属13县对照,里耶秦简牍不见佷山、义陵,多出门浅、上衍、蓬、沅阳、新武陵、上耑、荆山道。这已大大超出了以往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荆山道”并不属于洞庭郡。荆山道见于简8-1516:“廿六年十二月癸丑朔庚申,迁陵守禄敢言之:沮守瘳言:沮廿四年畜息子得钱殿。沮守周主。为新地吏,令县论言史(事)。·问之,周不在迁陵。敢言之。·荆山道丞印行。”结尾迁陵守禄上行的文书以荆山道丞印代理行事,作为行政效力的体现。“荆山道丞印”可与秦封泥“荆山道丞”、“荆山道印”互证,知荆山道为县级道制政区无疑。睡虎地秦简《语书》记南郡下行群发文书的行文格式为“南郡守腾谓县、道嗇夫”,一般认为此“道”具体指向的是南郡下属县级政区“夷道”。里耶秦简牍中洞庭郡下行群发文书的行文格式为“洞庭守礼谓县嗇夫”(8-657、12-1784、16-5、16-6),并无“道”字,我们主张秦代洞庭郡内并不存在“道”的建置,荆山道应排除在

①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汉时期”图组,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谭其骧:《秦郡新考》,《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12月;《秦郡界址考》,《真理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44年3月,两文均收入氏著《长水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另参见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收入氏著《燕说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3-361页;钟炜《里耶秦简牍所见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

③ 《汉志》“武陵郡”条下班固自注“高帝置”。《续汉书·郡国志》解释相对详细,曰:“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但显然都没有注意到洞庭郡的存在。关于楚黔中郡、洞庭郡、秦洞庭郡、汉武陵郡的关系,除前揭周振鹤等人的文章外,另可参高崇文《从考古发现谈战国时期秦楚关系》,《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255页,收入氏著《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韩]琴载元:《秦洞庭、苍梧郡的设置年代与政区演变》,《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等。徐少华、李海勇也根据早前公布的材料,从辖区范围和所属诸县的情况分析,指出“秦洞庭郡很可能就是汉武陵郡的前身或其主体部分”。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

④ 郭涛:《秦代南郡“阴”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期。

⑤ 《汉书》卷28《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4-1595页。

⑥ 于洪涛:《里耶简“御史问直络裙程书”传递复原——兼论秦汉<行书律>的实际应用》,《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0页;郑威:《里耶秦简牍所见秦即墨、洞庭二郡新识》,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简帛文献与古代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会议论文集》,上海,2013年10月,第212-224页,又见《出土文献所见秦洞庭郡新识》,《考古》2016年第11期;庄小霞:《〈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洞庭郡、南郡属县考》,《简帛研究(20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63页;游逸飞、陈弘音:《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第九层简牍释文校释》;游逸飞:《里耶秦简所见的洞庭郡——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一》,《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1期,2015年,修订本参看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16,2015年9月25日;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辑录》,《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47页。

洞庭郡属县之外。王伟即以荆山道为汉中郡属县^①。

此外,早前整理者怀疑里耶秦简牍9-1-11所见“阳陵”为洞庭郡属县^②,但学界对此多有异议。晏昌贵、钟炜曾根据文书传递时间较长、“道远毋环书”以及《战国策·楚策》等的记载,推断其前身可能是楚阳陵^③。论断有理有据。从《战国策·楚策》、包山楚简“阳陵”地望来看,楚“阳陵”地望可能在淮河以北地区^④,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破楚据有该地,沿楚建置设为秦阳陵县^⑤。近期公布的里耶秦简8-1450中有“冗佐八岁上造阳陵西就曰駟”的身份记录,“阳陵西就”属于駟的籍贯,类似“某就”的里名还见于8-1014、8-1083“居赀士伍巫南就路”,8-1328“居赀士伍江陵东就婁”。《续汉书·郡国志》“荆州刺史部·南阳郡·宛县”条,司马彪自注“有南就聚”^⑥,《汉志》南阳郡·宛县条,班固自注“县南有北筮山”,在育阳县下自注“有南筮聚,在东北”^⑦,对照地理位置,“南筮(滢)聚”就是“南就聚”,而文献中“滢”之名多见于楚地,属于较有楚国地域特色的地名命名方式^⑧,由此推知,“某就”属于楚地特有的地名类型,而里耶秦简牍所见秦县“阳陵”也应以楚地淮北阳陵为是,沿楚建制而有。

除了孱陵在秦时属南郡,里耶秦简牍所见索、临沅、沅陵、无阳、迁陵、辰阳、酉阳、零阳、充、潭成10县与《汉志》武陵郡属县一致。同时,索、迁陵和潭成以外的其他7县可以根据长沙漆木器等的记载证明在汉初仍属长沙国武陵郡^⑨。沅阳、门浅虽不见于《汉志》,但见于同批长沙漆木器,也可以确定汉初属武陵郡,这12县在秦时均当属洞庭郡。

里耶秦简牍中有两封洞庭郡“以道次传”的群发文件,透露了文书在洞庭郡境域范围内传递的路线。其中简8-159是一份皇帝“制书”逐级传送及回报的行政记录,内容为(释文采用宽释):

制书曰:举事可为恒程者上丞相,上洞庭络裙程有□□□
 卅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丞相令曰举事可为恒程者□上裙直。即应令,
 弗应,谨案致……
 ……丞相□□洞庭□。□手。
 三月丁丑朔壬辰,【洞庭】□□□□□□□□□□□□
 令□□□索、门浅、上行、零阳□□□以次传□□□□□□
 书到相报□□□□门浅、上行、零阳言书到,署□□发。
 □□□□一书以洞庭发弩印行事□□恒署
 酉阳报□报□署令发。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高□辰□以来。
 迁陵报,酉阳署令发。

① 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6页。

② 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校读(八则)》,《简牍学研究》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除洞庭郡属县说之外,还有关中说、楚国故地说等几种观点,参见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王伟认为,秦庄襄王葬地,《史记·吕不韦列传》作芷阳,《秦本纪》索隐作阳陵,阳陵可能如王辉先生所言,为“芷阳陵”省称,二者实为一地。王伟:《里耶秦简牍文书所见阳陵地望考》,《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④ 郑威:《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64页。

⑤ 李晓杰:《战国秦县新考》,《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⑥ 司马彪志、刘昭补注:《续汉书·郡国志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76页。

⑦ 《汉书》卷28《地理志上》,第1563-1564页。

⑧ 田成方:《春秋时期“滢”的分布区域及其人文地理学内涵》,《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⑨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12·29”古墓葬被盜案移交文物报告》,《湖南博物馆馆刊》第6辑,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29-368页。邱东联、潘钰、李梦璋:《简析长沙市博物馆2009年度征集的一批西漆耳杯》,《湖南博物馆馆刊》第6辑,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69-379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布令】□(8-159)^①

制书到达洞庭郡后,被要求分发到“……索、门浅、上衍、零阳……”,并“以次传”,理论上这些地点都应该在洞庭郡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酉阳、迁陵两地名则涉及到文书回报,文书最终到了文书出土地迁陵县。索、零阳为县并无疑义,门浅和上衍则是新见地名。里耶秦简牍8-66+8-208记“八月乙巳朔己未,门浅【守】丞敢告临沅丞主:腾真书,当腾腾,敢告主。定手。”“门浅守丞”的职官设置及与临沅县丞采用“敢告”的平行文书用语,都表明门浅在秦时为县。8-2414记“轲上衍守轲”,8-1450记“视事上衍”、“有论上衍”,上衍的情况与门浅类似。且简文所见“上衍印”(12-1784)与“沅阳印”(8-759、8-830+8-1010、8-1523)、“迁陵印”(8-540、8-728+8-1474、8-1225、8-1533、8-1626)一样,均指县长官之印。那么毋庸置疑,门浅、上衍与索、零阳同为秦洞庭郡属县。以下对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属于洞庭郡的沅阳、新武陵、上軫、蓬、门浅、上衍等县逐一进行说明。

沅阳。里耶秦简牍多见“以沅阳印行事”的文例,简8-755—8-759、8-1523所记从三十四年(前213年)六月至八月洞庭郡向迁陵县连续发送的三封文书,都以“沅阳印”为封缄。“沅阳印”即沅阳县长官之印。“沅阳”亦见于战国楚玺印,分别出土于今湖南长沙和湖南洪江市(原黔阳县)黔城镇^②。长沙为区域中心,且并不靠近沅水,其地出土“沅阳”印章未见引起较大关注。而今洪江市黔城镇僻处南方边地,位于沅水与其支流漵水交汇处,亦符合在沅水之北为阳的得名方式,郑威据此以为今黔城镇此处或即楚秦沅阳所在地,并根据里耶秦简牍主张沅阳有可能是秦始皇三十四年洞庭郡的郡治所在,秦洞庭郡曾从新武陵迁治于此,治所迁徙的原因当与武陵郡的设置有关^③,沅阳地望所在暂可凭信但根据用印情况来看洞庭郡治所在并得出郡治迁移的观点并不十分可取^④。

新武陵。简8-994记“十月辛丑,新武陵丞□”,以及15-259“新武陵丞赴”都表明其为秦县,且置年不晚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陈伟据简8-657“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以及简8-1677“一人与佐带上虜课新武陵”的记录,认为新武陵应是郡治所在。但未明其地望^⑤。郑威进一步证明了陈伟的观点。他将里耶秦简牍所见洞庭郡属县与《汉志》武陵郡属县对照,并结合魏晋时人常林《义陵记》“项羽弑义帝于郴,武陵人缙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的记载,提出秦简所见新武陵县为汉代义陵县前身的观点,将新武陵的地望定在今湖南溆浦县马田坪乡梁家坡村西北^⑥。他对新武陵地望的判断当无问题。

上軫。里耶秦简牍记载较多:

(1)廿六年端月己丑,上軫乡爰书轲人黑色、长面、大目,六尺九寸□轲

端月甲戌(辰),上軫乡奚敢言之轲

二月癸丑,新武陵丞赴敢告□轲(15-259)^⑦

(2)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壬辰,酉阳麟敢告迁陵主:或诣男子它,辞曰:士五,居新武陵軫上。往岁八月穀(击)反寇迁陵,属邦候显、候丞出。智名与反寇战,丞死,它狱迁陵论耐。它为候,遣它归复。令史畸追环它,更□。它穀(系)狱府,去亡。令史可以书到定时

① 释文改释参见姚磊《读〈里耶秦简(壹)〉札记(一)》,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92,2015年8月19日。

② 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2页;陈松长:《湖南古代玺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8页;施谢捷:《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73页。

③ 郑威:《里耶秦简牍所见秦即墨、洞庭二郡新识》及《出土文献所见秦洞庭郡新识》。游逸飞亦持有这种观点,参看游逸飞《“共治天下”前夕——战国至汉初的郡制变革》,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④ 参见[日]广濑薰雄《也谈里耶秦简〈御史问直络裙程书〉》,载《简牍与战国秦汉历史: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6论文集》,香港,2016年,第85-100页。

⑤ 陈伟主编,何有祖、鲁家亮、凡国栋撰著:《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6页。

⑥ 郑威:《里耶秦简牍所见秦即墨、洞庭二郡新识》及《出土文献所见秦洞庭郡新识》。

⑦ 原释文“甲戌”当是甲辰。参见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黄朴华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33页。

名吏(事)里、亡年日月,它坐论报赦(赦)臯云何,或覆问,毋有遣识者。当腾,腾,为报勿留。敢告主。(9-2290)^①

(3)七月辛巳,上軫守丞敬敢告迁陵丞主:写移令史,可以律令从【事,移】……(8-1219)

这三封文书尚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关联。鲁家亮认为简15-259之第一个“上軫”是县名,“乡”为人名。怀疑第二个“上軫”为“上津”之误释,上津乡为乡名,奚为人名^②。但从文书行政来看,爰书的制作方和“敢言之”的上书方应该是同一机构和人员,两个均应为上軫乡。里耶秦简牍中的“爰书”以乡制作为多,简文既然称“上軫乡爰书”,应更有可能就是上軫乡制作的爰书。更为突出的是,其后“上軫乡奚敢言之”已明确上軫乡的长官之名为奚。这样解释不至于曲折,且与一般的文书行政流程相符。文末言“新武陵丞赳敢告”,可以猜想此文书流程大致是上軫乡上行新武陵要求追查某人某事,而案件或群发或与迁陵县有涉,由“新武陵”以平行文书的格式书写并传送到“迁陵县”,这与简8-60+8-656+8-665+8-748、8-63等的文书行政流程相似。总之,二十六年正月时上軫为乡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简9-2290“土五,居新武陵軫上”,对照一般的书写格式,如:“守丞卮,上造,居竟陵阳处”(8-896),“启陵乡守夫当坐。上造,居梓潼武昌”(8-1445);以及张家山汉简《奏谏书》中的“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案例十四),“恢居郾邑建成里”(案例十五),“信,诸侯子,居雒阳杨里”(案例十六)^③,“居”地与一般籍贯的书写形式相同,均为“县+里”,此“軫上”为新武陵下辖里名无疑。至于“軫上”里与“上軫”乡有什么关系,暂时还不好确定。简8-1219则称“上軫守丞”,在里耶秦简牍中称“守丞”者多为县名,且文书以“敢告”的格式行文迁陵,属于平行文书,上軫或与迁陵平级而为县级政区。晏昌贵也猜测“始皇廿六年上軫为新武陵县下辖之一乡,后因某种原因升格为县”^④,只是“七月辛巳”尚不知是哪年七月。可以基本确定,上軫原为新武陵下辖之乡,后或升格为县,地望在新武陵附近^⑤。

蓬。见于简8-109+8-386、8-1558:

廿五年九月乙酉【朔】郾曰受蓬铁权郾蓬定以付迁□郾

九月丁亥,蓬丞章□郾(8-109+8-386)

郾□温与养隶臣获偕之蓬传,及告畜官遣之书季有□郾急封此。(8-1558)

“蓬”为新见秦县,蓬丞和蓬传舍的设置说明其为秦县无疑,且置县不晚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九月。游逸飞、陈弘音据简9-712+9-758(简文见下文)认为其属洞庭郡^⑥,所言当是。

“蓬”的设置有其独特之处。“受蓬铁权”之意为迁陵县接受蓬县颁发的铁权,权属衡器,以往所见两周衡器多为铜权^⑦,但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秦权亦见铁权,铸有始皇诏书^⑧。另

① 张春龙:《里耶秦简第九层选读》,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主办:“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2·秦简牍研究”,湖北·武汉,2012年11月17-19日。

② 里耶秦简牍校释小组:《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三)》(鲁家亮执笔),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79,2015年8月7日。

③ 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谏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355页。

④ 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辑录》,《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47页。

⑤ 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有待释疑,即上軫丞与迁陵丞两职官平级但上軫仍只是乡级政区,或是因为上軫乡位于郡尉治所新武陵县所在地位重要而有县丞的设置。

⑥ 游逸飞、陈弘音:《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第九层简牍释文校释》。

⑦ 张长寿、殷玮璋:《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473页。

⑧ 出土于内蒙古乌达盟赤峰三眼井,参见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163页。

外,简9-712+9-758所记洞庭郡的群发文书,除了分发郡属各县之外,还抄送副本分发都官,即“别书临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铁官”,与洞庭都水置于临沅一样,蓬为洞庭郡铁官所在地,铁权由“蓬”县制作和分发缘由如此。简10-673见“鬼薪苍输铁官”、10-1170“男卅人输或(铁)官未报”的记录^①。迁陵“受蓬铁权”的时间在秦统一天下前夕,这不仅是秦统一度量衡的具体举措,也从侧面反映《史记》所载秦统一时所发布的一系列整齐划一的规定,随着秦统一的进程已基本实施,只是待到二十六年才将其作为国家基本制度范定下来,将秦制由秦地向关东六国全面铺开。

“蓬”的地望,暂且只能从“铁官”这一线索去探寻。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三十四年质日”(原名历谱)反映南郡竟陵县附近存在“铁官”的建置^②,《汉志》所载南郡却并无铁官的设置,武陵郡亦然,个中原因尚无从稽考。与冶铸铁遗址见于北方不同的是,战国时期的铜矿冶遗址主要见于南方。今湖南湘西麻阳九曲湾铜矿遗址,是一处较大的战国时期的矿冶遗址,残存古矿井14处,矿井内保存部分井架和支柱,出土了木槌、撬棍、古铁锤和铁釜等物品^③。其地虽然以开采铜矿为主,但亦有冶铁的配套工具,洞庭郡铁官设置于此有其合理性。简14-469、16-233等“采赤金”的记载或与之有关。蓬县亦当离此不远,约在今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附近。

表1 秦洞庭郡与汉武陵郡属县对照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秦洞庭郡属县	索	临沅	沅陵	无阳	迁陵	辰阳	酉阳	新武陵(上耜)	零阳	充	沅阳	门浅	上衍	蓬	谭成		
汉初长沙国武陵郡属县*		临沅	沅陵	无阳	迁陵	辰阳	酉阳	义陵	零阳	充	沅阳	门浅					
《汉志》武陵郡属县	索	临沅	沅陵	无阳	迁陵	辰阳	酉阳	义陵	零阳	充					谭成	佷山	孱陵

* 参见何旭红《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90-195页。

综合以上分析,上耜为新武陵下辖之乡,或在二十六年之后某年由乡升格为县,若除去上耜,则洞庭郡的属县为15个,这恰恰与文献所记楚国“江旁十五邑”相合。战国末年秦人伐楚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走武关道沿汉水,从南阳而下荆襄,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率秦军拔楚郢都设为南郡;第二年(前277年),蜀守若出巴蜀沿峡江、西水而下,取楚巫郡和江南地域设为秦黔中郡,此为第二条路线。但并未维持多久,明年(前276年)楚人反于江南,夺回了秦占领的故楚江南地域,这些内容都记载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楚世家”中。“秦始皇本纪”记为“荆江南地”,“楚世家”则记为“江旁十五邑”,“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④实则一也。之后秦楚之间缔结和平协定,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态势。徐少华与李海勇曾结合里耶秦简分析,指出楚人于江南所置之郡就是洞庭郡: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山里耶秦简之“徒簿”》,《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
 ②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99页。
 ③ 湖南省博物馆、麻阳铜矿:《湖南麻阳战国时期古铜矿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2期;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
 ④ 《史记》卷6《秦本纪》,第234页;《史记》卷40《楚世家》。

从“江旁十五邑”又称“江南”的情况来看,这“十五邑”的多数应在南方地区,主要部分可能在今湘西北地区。楚人取“江旁十五邑”所置之郡的名称,文献无载,从其地域范围来看,唯有洞庭郡可堪当之,“江旁十五邑”很可能就是其所辖的十五县。若以上分析不误,则这十五邑(县)应包括迁陵、酉阳、索、临沅、孱陵、沅陵、零阳诸县在内。再联系到前引《楚策一》和《苏秦列传》有关洞庭、苍梧的记载,楚人收复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有可能是复置洞庭郡,其目的在于整合此地力量以抵抗秦人越过长江向南发展,同时亦可牵制其东进淮河流域。^①

根据位置关系,楚人于江南所置之郡的确有且只能是洞庭郡,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1年)时入为秦洞庭郡,境域及政区可能未作大的调整。秦洞庭郡所存续的时间大致与里耶秦简牍的时代跨度相当。至此,“江旁十五邑”的名目也可初步勾勒出来,它们同样也是秦代洞庭郡的属县:索、临沅、沅陵、无阳、迁陵、辰阳、酉阳、新武陵、零阳、充、沅阳、门浅、上衍、蓬、鐔成。当然,这只是楚、秦洞庭郡的大体关系,五十余年间名目是否存在变化及与秦统一进程的政治互动过程,也仍有待新资料展开细部分析。

二、洞庭郡内的道路交通网

早前,关于洞庭郡内部交通网络的研究主要根据简8-159洞庭郡府对皇帝制书的传递。于洪涛、郑威、庄小霞诸位先生的意见是“索、门浅、上衍、零阳……以次传”,表明文书在这四者之间接力传递,并据以考证门浅、上衍的地望。但是本简残缺较为严重,洞庭郡府下行的群发文件为何只去往这4个县,文书却最终到了迁陵县,这在逻辑上也无法讲通。根据残缺简文对洞庭郡交通所做的理解容易失当,相关县的定位也存在问题^②。近期公布的简9-712+9-758,与简8-159有诸多相似之处,可以补正此简文之缺。简9-712+9-758是洞庭假守发布的文书,简文如下:

【卅一年】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假守齮下□听书从事。临沅下索、门浅、零阳、上衍,各以道次传。别书临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铁官。皆以邮行。书到,相报;不报,追。临沅、门浅、零阳、上衍、□言书到,署兵曹发。如手。道一书。以洞庭候印【行事】。

迁陵报,酉阳署主令发。

急报,零阳金布发。恒署。丁四。

酉阳报,充署令发。

七月己未水十一刻,刻下十,都邮人□以来。□发。^③

与简8-159“制书”一样,文书同样要求分发索、门浅、零阳、上衍,并“以道次传”。两件文书所记录的洞庭郡内部下行文书的传递、回报程式大体一致,可以两相对读。游逸飞、陈弘音注意到简9-712+9-758“索、门浅、零阳、上衍”与简8-159“索、门浅、上衍、零阳”的顺序并不一致,他们对文书传递的线路和门浅、上衍地望的既有看法提出了怀疑^④;晏昌贵进一步指出文书传递并不是在这四县之间传递,而是分别代表了文书传递的四条线路^⑤。洞庭郡的行政文书由临沅分发,可见临沅地位

① 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楚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

② 于洪涛:《里耶简“御史问直络裙程书”传递复原——兼论秦汉<行书律>的实际应用》,第43-60页;郑威:《里耶秦简牍所见秦即墨、洞庭二郡新识》及《出土文献所见秦洞庭郡新识》;庄小霞:《<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洞庭郡、南郡属县考》。

③ 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黄朴华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04页;游逸飞、陈弘音:《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第九层简牍释文校释》。

④ 游逸飞、陈弘音:《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第九层简牍释文校释》。

⑤ 晏昌贵:《里耶秦简9-712+9-758补释》,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69,2013年12月24日。

之重要,目前来看应是郡守治所所在。自临沅发出后的第一站分别为索、门浅、零阳、上衍;文书到达后的回报也按照临沅、门浅、零阳、上衍的顺序^①。晏先生说道:

今按:上件(简9-712+9-758)为洞庭郡假守发往洞庭郡各县道的文书,文书的始发地是临沅,由临沅下分四路:索、门浅、零阳和上衍,“各以道次传”。又写副本由临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铁官。皆以邮行。”秦代文书传递要求收到文书后向发文单位回复(报)。其中传到迁陵县的那一路,根据文末的“报”,可以确定为临沅——零阳——充——酉阳——迁陵。其余三路因与迁陵无关,简牍中没有记载。由此可见,临沅为洞庭太守府发布文书的起点,亦即洞庭治所在。临沅《汉志》属武陵郡,秦则属洞庭郡。^②

在此基础上,他对门浅和上衍的位置做了推测,主张门浅和上衍分别在临沅的东、西,上衍在临沅西边某条河的上游^③。其说有一定的道理。郡府下行群发文件从临沅出发后,到迁陵的一条为①:临沅——零阳——充——酉阳——迁陵。此线西南走向,可西去巴蜀。里耶秦简牍记载:

郛□当阳□郛
 郛□□郛
 郛【零阳】郛
 郛过充传舍郛(8-2430)

所记大抵是官吏南行过南郡经当阳等地,之后由零阳、充最后到迁陵的出行记录,所走的就是别四道中到迁陵的这条路线。简5-1记录了文书从零阳传送到迁陵的时间:

元年七月庚子朔丁未,仓守阳敢言之:狱佐辨、平,士吏贺具狱县官,食尽甲寅,谒告过所县乡以次续食。雨,留。不能投宿,费。来复传。零阳田能自食。当腾,期卅日。敢言之。七月戊申,零阳葬移过所县乡。齑手。七月庚子朔癸亥,迁陵守丞固告仓嗇夫:以律令从事。嘉手。

迁陵食辨、平尽己巳旦□□□□迁陵。
 七月癸亥旦,士五(伍)臂以来。嘉发。(5-1)^④

文书七月戊申(9日)从零阳发出,七月癸亥(24日)到迁陵,耗时约15天。此线被清晰勾稽之后,“临沅下,别四道”的其他三条线路也可相应推定。里耶里程简16-52里程简记:

郛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卅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千四百卅里。^⑤

“临沅下,别四道”后第一站为索的文书传递线路应当是东北线,具体线路为②:临沅——索(…孱

① 文书同时传到与县同级的机构——都官,而洞庭都水就在临沅县境内,所以回报时由都官最先报到临沅。这也从侧面证明临沅为郡治的可能性。洞庭郡治所问题与秦郡长官守、尉分治有关,容另文详细探讨。

② 晏昌贵:《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辑录》,第145-146页。

③ 晏昌贵:《里耶秦牍9-712+9-758补释》。

④ 陈根昶将“具狱县官”连读,可从。参见陈根昶《里耶秦简8-1523编连和5-1句读问题》,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94,2013年1月8日。

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第198-199页。

陵…江陵…咸阳)。此线在洞庭郡内除临沅外虽只经一县,但却是今湖南地区在当时最为重要的一条交通线路,可视为秦驰道南郡段的南延线,是各县去往郡治后,经由南郡北往中原和关中的主干道。

值得注意的是,简8-159、9-712+9-758文书传递分道时零阳与上衍的顺序可以对调,且门浅在零阳和上衍之前,在索县之后;回报时的顺序是门浅在临沅和零阳之间。零阳、上衍顺序的排列,表明两地到临沅的距离可能相当。

门浅。“门浅”之名此前多见于长沙汉墓中。长沙斩犯山7号汉初墓葬出土了1枚“门浅”印文的滑石印,长沙“12.29”盗墓案追缴漆器铭文有“门浅库”,另见“七年门浅长平丞都库应工勇造”(009号)之物勒工名,何旭红推测汉初门浅属长沙国^①。门浅距今长沙不会太远。里耶秦简牍见迁陵徒隶“助门浅”(8-1861、10-1170)、“载粟门浅”的记录(9-1481)^②。门浅或在沅水沿线,迁陵通过酉水、沅水可以较为便利地载粟到门浅。回到里耶秦简洞庭郡下行群发文书传递的四县排列,传递时门浅列于第二,位于索和零阳之间,到门浅文书的回报时间又长于临沅短于零阳和上衍,这一书写顺序与各县到临沅的距离是相一致的。临沅到门浅的里程应当在到索和到零阳的里程之间,门浅位置偏东南。今桃源县青林乡有一座东周至汉代的城址,称“采菱故城”(亦名“黄楚城”),《桃源县志》记载为楚平王所筑。据调查,城址呈长方形,坐西朝东,南北残长约830米,东西残宽约600米,总面积0.34平方公里。现残存城墙10段,最长的14.25米,高7米,护城河遗址尚存,宽20-30米。在城内采集到大量的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泥质灰陶陶片,器物有绳纹筒瓦、绳纹陶鬲,时代为东周。城中央有较高台地,西为墓葬区,先后发掘战国至西汉古墓一百余座。城池较大,年代跨度从战国到西汉^③。采菱故城的这些特征在延续时间、地理位置、以及作为县城的规模上都与门浅相吻合,故而可以大致推定门浅地望在今湖南桃源县北青林乡附近。以门浅为第一站的该条路线是“临沅下,别四道”的南线方向,洞庭郡府更多的属县置于沅水流域,文书自然也需要向南传递到这些地方。铁官在蓬县,此县也当在临沅别四道之沅水流域的第三道上。经过门浅的第三道为③:临沅——门浅——沅陵——辰阳——新武陵(上軫)——蓬——无阳——沅阳——鐔成(“临沅下,别四道,以次传”的路线,见图1)。此线主要沿着沅水南行。

上行。里耶秦简牍8-1450记:

冗佐八岁上造阳陵西就日駟,廿五年二月辛巳初视事上行。病署所二日。·凡尽九月不视事二日,·定视事二百一十一日。

廿九年后九月辛未行计,即有论上行。卅年

□不视事,未来。(8-1450)

该简显示上衍在秦王政二十五年二月(前222年)已设为秦县,洞庭郡入秦的时间大抵也在此前后。从临沅下后的四县格局来看上衍的地望约在临沅以西;又结合别四道的其他路线和古今湘西地区的州县设置、交通情况^④,上衍的地望可进一步确定在今常德西北的石门县附近。此地亦有较多古城址,如石门古城堤城址、临澧申鸣城等。其中,石门古城堤城址位于湖南省石门县维新乡古城村,城址作长方形,城垣夯筑,城垣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0米,面积0.18平方公里。城垣宽约6

① 陈松长:《湖南古代玺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何旭红:《对长沙谷山被盗汉墓漆器铭文的初步认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六辑,岳麓书社2009年版;何旭红:《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90-195页。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山里耶秦简之“徒簿”》,《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

③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据报道,近期考古工作者又在青林乡养耳村发现了一座战国至汉代的古城遗址。该遗址城墙夯筑的痕迹清晰可见,城墙外面亦有一条护城河。

④ 湖南省交通厅:《湖南公路史》(第一册)第一章“公路史前的道路”,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

米,高约2-3米。城址时代为东周,城内发现有东周时期的陶豆、钵、鬲等^①。第四条路线为④:临沅——上衍,上衍以西并无其他洞庭郡属县。而简12-1784是三十二年(前214年)正月洞庭郡下行的群发文书:

卅三年正月壬申朔戊戌,洞庭段(假)守□谓县嗇夫:廿八年以来县所以令糴粟固各有数,而上见,或别书,或弗居。以书到时亟各上所糴粟数后上见存。署见左方曰:若干石、斗,不居日。署主仓发。它如律令。县一书·以临沅印行事。

二月壬寅朔甲子,洞庭段(假)守黠追县:亟上勿留。配手·以上衍印行事。

三月丙辰日中邮人□以来。□发。歇手。(12-1784)^②

文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县“上糴粟数”,文书传递以“县一书”即郡府直达各属县的“邮行”形式,与“别四道,以次传”不同。文书的目的地同样是迁陵,但文书发出时是“以临沅印行事”,追踪时却“以上衍印行事”,或许是洞庭假守的人选有所变动之故。

“临沅下,别四道”的设置遵循了湘西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征,分别对应:西部澧水——西水流域,北部洞庭湖流域,南部沅水流域,西北地区。第一条路线跨越澧水、西水流域,采用水陆接力的方式,而不是直接走从临沅溯沅水而上至沅陵,改溯西水到迁陵的水陆。临沅到索的路线也是走的陆路官道。总的来说,“临沅下,别四道”大体上采取沿着河流水、陆路并行的灵活的交通方式,因为“以次传”文书主要保证的并非文书的时效性,而是文书接收对象的覆盖面。

同时,根据具体内容,文书传递的路线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走沅水改溯西水到迁陵的水陆也是一条日常行政的主要道路,简16-52临沅到迁陵段可能就是这一条路,可资参证的是虎溪山汉简记有沅陵侯国到首都长安的水路里程:“上沅水与辰春界死浴,死浴到廷百一十六里,廷到长安道函浴三千二百一十九里,其四百卅二里沅水。”^③其中明确沅陵侯国的廷到长安的里程是3219里,沅陵到临沅走沅水的里程为432里,北上的其他路段自然以陆路为主,应该就是简16-52中临沅以北的路段。简6-4记载迁陵县令史意到沅陵校讎律令曾找县廷借船:

□年四月□□朔己卯,迁陵守丞敦狐告船官□:令史意讎律令沅陵,其假船二艘,勿留。(6-4)

迁陵乘船沿西水下行会经过旁县酉阳。

尉敬敢再□(拜)谒丞公:校长宽以迁陵船徙卒史【酉阳,酉阳】□□【船】□元(沅)陵,宽以船属酉阳校长徐。今司空□□□□□丞公令吏徒往取之,及以书告酉阳令来归之。盗贼事急,敬已遣宽与校长因吾追求盗发田官不得者。敢再□(拜)谒之。(8-167+8-194+8-472+8-1011)

两地也有陆路可通,但似乎不太好走,简9-2352记:

□□年三月庚申,启陵乡赵爰书:“士五胸忍漆居壹告曰:‘居賁署酉阳,传送辜迁陵拔乘马□□牡两□删取□□前后各一所,名曰发难。行到暴诏溪,返上,去溪可八十

①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古城堤城址试掘》,《考古》1964年第2期;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页;申鸣城遗址介绍见《2006年度南方地区考古新发现》,《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② 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黄朴华编著:《湖南出土简牍选编》,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26页。释文略有订补。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洞庭郡县道交通网络的一种日常使用情形,或者说是郡守群发行政文书的一般情况。在此之外,同样存在“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8-657)的形式。即便都是分为四道传递文书,但由于郡守、郡尉分治,郡尉所分发的文书以新武陵为出发点,只能采取不同的传递路径,大抵可能是:往南沅水流域为一线;往西经沅陵、酉阳、迁陵为一线;往北经沅陵、门浅、临沅后分为两条线,折向西北上衍、零阳、充为一线;直北到索为一线。两相对照,洞庭郡守治所偏北且文书路线少有交叠,这样更利于日常的文书行政;郡尉治所偏南,文书行政路线在沅陵和临沅有交汇并非最优方案,选定该地或许是出于帝国扩张和岭南军事的战略考虑。

结 语

洞庭郡群发文书分四道传递,这些路线不仅是洞庭郡内部文书传递的主干路线,也是洞庭郡与外部郡县交往的依托,其所从属的交通网络,支撑着洞庭郡的地方行政事务。同时,它与其他区域的道路交通相衔接,共同建构起了秦汉帝国的道路交通体系,在帝国行政中发挥着经络的作用。

帝国中央下发的文书,经由道路交通网络发往郡府、县道,各单位再依次下发。各郡府、县道之间或内部的往来文书,传递形式大同小异,并由专职人员或一般官吏、仆养传递。郡县之间的文书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从秦汉简官吏出行的留宿地来看,既有县乡之地,亦有关邮之所,乃至更小的地名,这些都是文书传递者往来所经交通站点。文书到达县廷后,再下行到各机构和乡部,使官吏悉知,并由各部通报黔首、徒隶、戍卒等行政对象。邮驿系统与帝国的日常统治紧密相关^①。以律令为指导,文书为载体,借助于初成体系的郡县行政制度和相对完善的道路交通网络,秦帝国的行政政令,得以贯穿整个帝国,发挥着行政效能。

(责任编辑:陈炜祺)

Documen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on County Levels in Dongting Prefecture

Guo Tao

Abstract: Liye Qin bamboo slips were file remains of Qianling county in Dongting prefecture, which provided a rare case of understanding the realities of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passing documents, we can restore the buildings of fifteen counties in Dongting and the transport network on county levels. The process began to LinYuan where was the capital of Dongting, or the Xin Wuling county, and then passed through four routes in turn. These routes were not only the main route in Dongting, but also the media of Dongting interacted with external counties, and they affiliated with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which supported the daily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of Dongting County.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connected with other areas of road traffic, constructing the road traffic system in Qin and Han empire, and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what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were to body. With the laws as the guides, the documents as the carriers, relying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relatively perfect transport network, the administrative decrees of the Qin empire were able to run through the entire empire and develop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Keywords: Liye Qin Bamboo Slips; Dongting Prefecture; Administration; Documents; Transportation

^① 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侯旭东:《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64页。